

## 大法官會議解釋：

發文單位：司法院

解釋字號：釋字第509號

解釋日期：民國 89 年 07 月 07 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公報 第 42 卷 9 期 1-30 頁總統府公報 第 6354 號 4-40 頁

相關法條：中華民國憲法 第 11、23 條  
第 310、311 條 中華民國刑法

解 釋 文：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憲法第十一條有明文保障，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惟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尚非不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誹謗罪即係保護個人法益而設，為防止妨礙他人之自由權利所必要，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意旨。至刑法同條第三項前段以對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係針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限定刑罰權之範圍，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惟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亦不得以此項規定而免除檢察官或自訴人於訴訟程序中，依法應負行為人故意毀損他人名譽之舉證責任，或法院發現其為真實之義務。就此而言，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三項與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旨趣並無牴觸。

理 由 書：憲法第十一條規定，人民之言論自由應予保障，鑑於言論自由有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形成公意，促進各種合理的政治及社會活動之功能，乃維持民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不可或缺之機制，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保障。惟為保護個人名譽、隱私等法益及維護公共利益，國家對言論自由尚非不得依其傳播方式為適當限制。至於限制之手段究應採用民事賠償抑或兼採刑事處罰，則應就國民守法精神、對他人權利尊重之態度、現行民事賠償制度之功能、媒體工作者對本身職業規範遵守之程度及其違背時所受同業紀律制裁之效果等各項因素，綜合考量。以我國現況而言，基於上述各項因素，尚不能認為不實施誹謗除罪化，即屬違憲。況一旦妨害他人名譽均得以金錢賠償而了卻責任，豈非享有財富者即得任意誹謗他人名譽，自非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本意。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一項：「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第二項：「

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係分別對以言詞或文字、圖畫而誹謗他人者，科予不同之刑罰，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權益所必要，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之比例原則尚無違背。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三項前段規定：「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係以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事項之行為人，其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為不罰之條件，並非謂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惟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亦不得以此項規定而免除檢察官或自訴人於訴訟程序中，依法應負行為人故意毀損他人名譽之舉證責任，或法院發現其為真實之義務。就此而言，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三項與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旨趣並無牴觸。刑法第三百十一條規定：「以善意發表言論，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罰：一、因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之利益者。二、公務員因職務而報告者。三、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四、對於中央及地方之會議或法院或公眾集會之記事，而為適當之載述者。」係法律就誹謗罪特設之阻卻違法事由，目的即在維護善意發表意見之自由，不生牴觸憲法問題。至各該事由是否相當乃認事用法問題，為審理相關案件法院之職責，不屬本件解釋範圍。

蘇大法官俊雄提出之協同意見書、吳大法官庚提出之協同意見書。

協同意見書：

蘇大法官 俊雄

多數意見通過的解釋文，對刑法第三一〇條第三項就誹謗罪所設定之客觀處罰條件做了進一步的合憲法律解釋，從而肯定刑法第三一〇條處罰誹謗行為之立法，尚符合憲法第十一條及第二十三條規範意旨；就此解釋結論，本席亦表贊同。惟對國家一方面必須保障言論自由，而他方面又必須滿足對人民人格名譽權益加以適當保護之義務要求的兩難情況下，對於此際所面臨的「基本權衝突」問題，究應如何解決？這項課題於立法上及法律的解釋適用上，又應如何考量？就此多數意見通過的解釋文及解釋理由，於論理說明上恐未盡明確。

另查言論自由，就個人之自我實現以及政治社會生活的活潑發展而言，均至關重大，理應於立憲法秩序下，受到最大限度之保障；從而，針對限制言論自由（特別是言論內容）之法規範的違憲審查，自應採取最為嚴格之審查標準，俾確保此項規範意旨之貫徹。不過，系爭的法律規範因另涉及基本權衝突問題的價值權衡，基於功能法的考量，釋憲機關恐仍應適度尊重具有民主正當性之立法者所為的價值權衡；故本案於審查標準的擇取上乃必須有所修正。可惜對於此項基本審查立場，多數意見未能於解釋理由中適切闡明，致令本件解釋致力探求在權益平衡下賦予言論自由最大

保障之苦心美意，恐難為社會大眾所明確感知，甚或懷疑大法官保護言論自由之用心不足。為填補上述二點缺憾，爰提出協同意見書，補充說明如下：

#### 一 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基礎理論

多數意見通過的解釋文，認言論自由有個人實現自我、促進民主政治、實現多元意見等多重功能；對此項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基礎理論說明，本席亦表贊同。惟解釋文中另強調之促進「監督」政治、社會公意的功能，此對媒體來說，固不無促進新聞公正報導的作用，但是就人民意見表現之自由而言，恐引起誤導，尚有予以澄清的必要。蓋言論自由既攸關人性尊嚴此項憲法核心價值的實現，在多元社會的法秩序理解下，國家原則上理應儘量確保人民能在開放的規範環境中，發表言論，不得對其內容設置所謂「正統」的價值標準而加以監督。從而針對言論本身對人類社會所造成的好、壞、善、惡的評價，應儘量讓言論市場自行節制，俾維持社會價值層出不窮的活力；至如有濫用言論自由，侵害到他人之自由或國家社會安全法益而必須以公權力干預時，乃是對言論自由限制的立法考量問題，非謂此等言論自始不受憲法之保障。故若過份強調其監督政治、社會活動的工具性功能，恐將讓人誤以為憲法已對言論內容之價值做有評價，甚至縮限了對於言論自由的理解範圍。

準此，吾人固不否定言論自由確實具有促進政治社會發展之功能，但是應注意並強調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並不受此項工具性思考所侷限，更不應為其所誤導。

#### 二 基本權之衝突及其解決之道

憲法保障的不同基本權之間，有時在具體事件中會發生基本權衝突——亦即，一個基本權主體在行使其權利時，會影響到另一個基本權主體的基本權利實現。基本權利之間發生衝突時，也就是有兩種看起來對立的憲法要求（對不同基本權的實現要求）同時存在；此時，必然有一方之權利主張必須退讓，方能維持憲法價值秩序的內部和諧。由於憲法所揭示的各種基本權，並沒有特定權利必然優先於另外一種權利的抽象位階關係存在，故在發生基本權衝突的情形時，就必須而且也只能透過進一步的價值衡量，來探求超越憲法對個別基本權保護要求的整體價值秩序。

就此，立法者應有「優先權限」（Vorrang）採取適當之規範與手段，於衡量特定社會行為態樣中相衝突權利的比重後，決定系爭情形中對立基本權利實現的先後。而釋憲者的職權，則在於透過比例原則等價值衡量方法，審查現行規範是否對於相衝突的基本權利，已依其在

憲法價值上之重要性與因法律規定而可能有的限制程度做出適當的衡量，而不至於過份限制或忽略了某一項基本權。至於在個案適用法律時，行政或司法機關亦應具體衡量案件中法律欲保護的法益與相對的基本權限制，據以決定系爭法律的解釋適用，追求個案中相衝突之基本權的最適調和。

由誹謗行為所引起的社會爭議，基本上便是一種典型的基本權衝突問題；蓋此際表意人所得向國家主張之言論自由防禦權，會與人格名譽受侵害者所得要求國家履行的基本權保護義務，發生碰撞衝突。面對此項難題，立法者一方面必須給予受到侵擾的人格名譽權益以適當之保護，滿足國家履行保護義務的基本要求，他方面亦須維持言論自由的適度活動空間，不得對其造成過度之干預限制。而在社會生活型態多樣的情況下，如何妥慎區分不同的生活事實以進行細緻之權衡決定，更是此項基本權衝突能否獲致衡平解決的重要關鍵。

### 三 針對刑法第三一〇條之違憲審查與合憲解釋

基於上述的理解，對於刑法第三一〇條以下有關誹謗行為之處罰規定，我們可以析繹出立法者就此所為的三項基本權衡決定：

- (一) 立法者首先選擇以刑法規範機制—此種干預強度較大的方式，來保護人民的人格名譽權益，使人格名譽受到侵擾之人民，得以請求國家以刑罰方式制裁相對人，而非僅透過民事賠償制度解決其間之紛爭。
- (二) 立法者藉由第三一〇條客觀處罰條件之規定，進一步設定了誹謗罪的可罰性範圍。簡言之，其係以言論事實陳述的「真實性」以及「公共利益關連性」兩項標準，對於此際所涉及的基本權衝突情形做了類型區分，並分別做了不同的價值權衡。從而，於言論人所為的事實陳述係真實且與公共利益相關時，基於此際言論自由之保護應優先於人格名譽權益維護之價值權衡，立法者特將之排除於誹謗罪之處罰範圍外；而在所為事實陳述不真實或雖真實但僅涉及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的情形，立法者則認為此際的人格名譽權益重於言論自由之價值，故此際侵犯到他人人格名譽法益之言論表現，必須受到刑法之制裁。
- (三) 立法者另於第三一一條設定多項阻卻違法事由，使法院得據以於個案中就可能的基本權衝突情形，於違法性的判斷上做進一步的衡量決定。

上述立法者所為的權衡決定，固然履行了國家對於人民人格名譽權益的保護義務，並且具備憲法第二十三條就國家限制人民基本權利（言論自由）時所要求的目的正當性；可是其是否已對言論自由造成過度

的，不必要的干預限制，毋寧仍存有相當的違憲疑義。就此，本席同意多數意見的看法，認為單從立法者選取刑法規範約制人民言論自由之作法本身，尚無法推導出系爭規範已過度干預言論自由之違憲結論。因為做為可能之替代方案的民事損害賠償制度，固在干預強度上較為輕微，可是其是否可達到與刑法保護法益相同的有效性強度，尚非無疑義。有關誹謗行為是否應予除罪化的問題，因此仍應尊重立法者於衡量政治、社會、文化等各種情狀後所為的政策決定，而無法逕由釋憲機關代為決定。

然而，本席必須強調，如果系爭規範並未針對不同類型的生活事實做出妥慎的衡量決定—亦即未將誹謗罪之處罰範圍限定於必要的範圍內，則該規範仍屬過度侵犯人民之言論自由，而應受違憲的評價。對此，本席認為立法者以事實陳述之「真實性」以及「公共利益關連性」兩項基準進行權衡的作法及其結論，固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如過分執著於真實性的判別標準或對真實性為僵硬之認定解釋，恐將有害於現代社會的資訊流通。蓋在社會生活複雜、需求快速資訊的現代生活中，若要求行為人（尤其是新聞媒體）必須確認所發表資訊的真實性，其可能必須付出過高的成本，或因為這項要求而畏於發表言論，產生所謂的「寒蟬效果」（chilling effect）。無論何種情形，都會嚴重影響自由言論所能發揮的功能，違背了憲法保障言論自由的意旨。另一方面，如果進而將第三一〇條第三項之規定，解釋為行為人必須負證明所言確為真實的責任，更無異於要求行為人必須證明自己的行為不構成犯罪，亦違反了刑事法上「被告不自證己罪」的基本原則。

為避免上開違憲狀態之發生，吾人實應對第三一〇條之處罰範圍做嚴格之認定，而對第三一〇條第三項規定，做取向於合乎憲法意旨的解釋。從而，所言為真實之舉證責任不應加諸於行為人，法院對於系爭言論是否為真實仍有發現之責任；並且對於所謂「能證明為真實」其證明強度不必至於客觀的真實，只要行為人並非故意捏造虛偽事實，或並非因重大的過失或輕率而致其所陳述與事實不符，皆應將之排除於第三一〇條之處罰範圍外，認行為人不負相關刑責。

在對相關的刑法規定做出限縮解釋後，本席方得出現行關於誹謗罪之規定，乃為保護人格權而對特定類型言論所為之必要限制，因而與憲法第十一條、第二十三條並無牴觸。

#### 四 法院衡平之裁量責任

最後，在對系爭規定做出合憲認定之後，本席仍不辭贅言地要提醒相關機關（包括檢察官與法院等），其亦有責任在個案的法律適用中，

貫徹憲法對言論自由高度保障之意旨。除了對於刑法第三一〇條之解釋適用，應依前述解釋意旨嚴格認定誹謗罪之處罰範圍外，更須審慎衡量個案中是否具備第三一一條所提示之阻卻違法事由及其他可能之超法規事由，俾於權益衡平之前提下，確保言論自由之最大活動空間。

爰提協同意見書如上。

協同意見書：

大法官 吳 庚

本件解釋開宗明義揭櫫言論自由對建立民主多元社會有無可替代之功能，憲法應予以最大限度之保障。惟基於諸多因素，大法官盱衡現階段社會發展實際情況，並未採納時論甚囂塵上之誹謗除罪化主張，而對刑法第三百十條誹謗罪之構成要件該當性作限縮解釋，在此一前提之下，認為上開刑法條文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與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尚無違背。是本件係以轉換 (Umdeutung) 同條第三項涵義之手段，實現對言論自由更大程度之維護同時又不致於宣告相關條文違憲，在解釋方法上屬於典型之符合憲法的法律解釋 (verfassungskonforme Gesetzesauslegung)。

查現行刑法第三百十條誹謗罪之規定與德國刑法第一百八十六條之規定相當，德國刑法該條之文字為：「提出或傳述侮辱他人或足以使他人公眾觀感中喪失尊嚴之事實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罰金，但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在此限。以公開或文書為上述行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罰金。」上開譯文之但書所稱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在此限，依德國通說乃係對「有懷疑應作有利被告認定」(in dubio pro reo) 所為之例外規定 (參照 A.

Schonke/H. Schroder, Strafgesetzbuch. Kommentar, 21. Aufl., 1982, S. 1194)，換言之，對於該條之罪，刑事法院固仍有依職權調查之義務，惟被告須負證明所指摘或傳述者係屬事實之舉證責任，此與向來我國通說對刑法誹謗罪之詮釋尚無顯著不同。依本件解釋意旨，被告之舉證責任將有相當程度之減輕，嗣後不能僅以行為人不能證明其言論內容為真實即以刑責相繩。除行為人得提出相當證據證明所涉及之事實並非全然子虛烏有外，檢察官、自訴人或法院仍應證明行為人之言論係屬虛妄，諸如出於明知其為不實或因輕率疏忽而不知其真偽等情節，始屬相當。

按陳述事實與發表意見不同，事實有能證明真實與否之問題，意見則為主觀之價值判斷，無所謂真實與否，在民主多元社會各種價值判斷皆應容許，不應有何者正確或何者錯誤而運用公權力加以鼓勵或禁制之現象，僅能經由言論之自由市場機制，使真理愈辯愈明而達去蕪存菁之效果。對於可受公評之事項，尤其對政府之施政措施，縱然以不留餘地或尖酸刻薄

之語言文字予以批評，亦應認為仍受憲法之保障。蓋維護言論自由即所以促進政治民主及社會之健全發展，與個人名譽可能遭受之損失兩相衡量，顯然有較高之價值。惟事實陳述與意見發表在概念上本屬流動，有時難期其涇渭分明，若意見係以某項事實為基礎或發言過程中夾論夾敘，將事實敘述與評論混為一談時，始應考慮事實之真偽問題。據此，刑法第三百十一條各款事由，既以善意發表言論為前提，乃指行為人言論涉及事實之部分，有本件解釋上開意旨之適用。

本件可決多數通過解釋文及理由書，本席亦表贊成，然略感意有未盡，爰提協同意見書如上。

大法官會議主 席 翁岳生

大法官 劉鐵錚

吳 庚

林永謀

施文森

孫森焱

陳計男

曾華松

董翔飛

楊慧英

戴東雄

蘇俊雄

黃越欽

賴英照

謝在全

抄黃○仁、林○秋二人聲請書

主 旨：為臺灣高等法院八十六年度上易字第二六一七號刑事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三百十一條等規定，涉有牴觸憲法第十一條保障新聞自由、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人民工作權意旨、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及正當法律程序等之疑義，謹呈請解釋事。

說 明：一、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新聞自由為民主憲政與自由社會基石，新聞自由與民主政治互成正比，故新聞自由乃現代民主自由社會不可或缺之必要機制，誠屬毋庸置疑。而我國憲法第十一條明文規定對言論自由之保障，解釋上當然亦包含新聞自由在內，新聞從業人員之工作權亦應為憲法第十五條所保障。因此，臺灣高等法

院以八十六年度上易字第二六一七號刑事確定終局判決，援用刑法第三百十條及第三百十一條之誹謗罪規定，判處聲請人黃○仁及林○秋應就所報導之新聞負誹謗罪責，聲請人認為該確定判決所適用之刑法第三百十條及第三百十一條誹謗罪規定涉有以下之違憲疑義：

刑法第三百十條規定以刑罰懲處新聞報導涉有誹謗之行爲，牴觸憲法第十一條保障新聞自由之意旨及第二十三條規範之比例原則：

以刑罰懲處發表新聞報導之記者，易使職司公權力行使之政治人物藉諸刑罰來追訴新聞媒體言論之法律責任，進而令媒體因畏於刑責而自我限制言論，達到其控制媒體言論目的，大幅減低新聞自由所能發揮之監督功能，如此將使資訊流通停滯，人民無從得知充分訊息，發表意見，凝聚民意，政府公權力之行使更可不受監督，使民主政治機制中之公權力與民意間失去衡平，形成公權力一言化獨斷專擅之現象。

是以，以刑罰懲處新聞媒體新聞報導之行爲，其立法目的縱是爲保障私人名譽，然其結果恐將是使之淪爲有心政治人物用以箝制新聞言論之工具，破壞公權力行使與公眾民意間之溝通、監督衡平機制，不僅嚴重牴觸憲法第十一條對新聞自由之保障意旨，與憲法所追求之民主自由精神相違背，更顯然違背憲法第二十三條規範之比例原則。

再者，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三項規定「能證明所誹謗之事爲真實者，不罰」，違反正當法律程序保障原則：

按證明被告有罪之舉證責任應由擔任控方之檢察官或自訴人負擔，爲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一條及第三百二十九條所明定；又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一條之規定，證人有因恐受刑事追訴或處罰之拒絕證言權，則舉輕足以明重，任何刑事被告更應絕無自證自己無罪之義務，此乃刑事案件上「假設被告無罪原則」所當然之理。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三項規定要求被控涉有誹謗罪嫌之新聞從業人員，必須舉證證明其所爲之報導內容爲百分之百真實，始能免於誹謗罪之刑罰，形同課予身爲刑事被告之新聞從業人員自證無罪之舉證義務，顯然已違背對被告之「假設無罪原則」，違反憲法所規定之正當法律程序，而此一立法單獨課予誹謗罪案件之被告「自證無罪」之舉證義務，亦顯然違反憲法第七條之平等原則。

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三項規定被控涉誹謗罪嫌之記者應舉證證



# 兒童隱私權與新聞自由報告 籲尊重兒童隱私權

日期2005-10-13 11:19:11

文章主題:09.新聞時事

## 【兒福聯盟聲明稿】嚴正抗議媒體刊登兒童受虐致死照片 扼殺受害男童隱私與尊嚴，戕害兒童少年閱聽感受

日期 2005-11-27 22:31:23 | 文章主題: 兒少與媒體

桃園市前晚（11/23）傳出男童遭母親及同居男友過當管教，最後送醫不治的悲劇！眼見又一個稚嫩的小生命受盡折磨而殞落，我們何其痛心！但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在發生這麼多起兒童受虐致死的不幸事件之後，竟有媒體將這名受虐男童的姓名、身分、照片、甚至全身傷痕累累的遺體畫面，未經匿名、保護處理便直接刊出，嚴重侵犯兒童隱私權，罔顧往生男童尊嚴，並影響兒童少年的閱聽感受，讓未成年的孩子或一般大眾看來倍感不舒服，身為兒童權益的代言人，我們對此粗糙、噬血的報導，表達最強烈的抗議與譴責！

聯合報、蘋果日報揭露受虐男童的照片與身分資訊，嚴重侵犯兒童隱私權！

今天（11/25）的聯合報 A8 版「母與同居人 打死六歲兒」，以及蘋果日報 A3 版「虐 3 小時 6 歲童慘死」兩篇報導，內容揭露了這名受虐男童的全名、就讀學校與年級，還刊出男童的正面半身照片。男童年僅六歲，自是「兒童及少年福利法」所保護的對象，根據兒少法第 46 條規定，媒體不得報導或記載受虐兒童的姓名或足以識別其身分的資訊，聯合報與蘋果日報的報導手法明顯失當，不但侵犯了男童的隱私權，甚至有觸法之虞！此外，為了讓受虐兒童的保護更為周延，我們建議主管機關應比照「媒體對性侵害事件之報導保護被害人處理原則」第二條規定，規範媒體報導兒虐事件時，即使受虐者已死亡，仍不得在報導中曝光受虐兒童的個人基本資料及相關資訊。

兩大報的不當報導，等同踐踏往生男童的尊嚴，罔顧新聞工作者的從業倫理！

對於兩大報在報導中直接刊登受虐男童照片的「用意」，我們百思不得其解！受虐男童雖已不幸往生，但即便是六歲的孩子，也和成人同樣享有身為一個「人」應得的尊重。撇開法律不談，媒體工作者處理這則新聞時，怎麼可以漠視往生男童的尊嚴，棄守新聞工作者的從業倫理，讓男童的身分資訊全都曝光？年初邱小妹妹受虐致死案殷鑑不遠，回顧事件爆發當時，尚未有媒體以如此粗糙手法進行報導，如今聯合報和蘋果日報竟大開倒車，令人扼腕！

男童遭虐之遺體照片未經處理即予刊登，明顯違反兒少法規定，主管機關應正視並儘速予以裁罰！

今日（11/25）蘋果日報 A3 版將男童全身傷痕累累的遺體照片，未進行任何處理便逕予刊出，這張照片赤裸裸且殘忍地呈現男童身體受虐的慘狀，顯已違反兒少法第 30 條第 12 款規定，對兒童及少年提供有害其身心發展的資訊，如此惡質的報導，實屬媒體教化的最壞示範，主管機關應就蘋果日報違法之情事，儘速予以裁罰，以積極維護兒童少年的閱聽權益！

☆媒體聯絡人：兒童福利聯盟 王育敏執行長 27486006 # 131 0925889725

李宏文組長 27486006 # 145 0910521351

來源：[兒少權益資訊網](#)

## 兒虐新聞背後之社會警訊

社會安全組研究助理 林慧芬

關鍵字： 兒童虐待 兒童福利

一月中旬，中華民國兒童及家扶基金會，評選出二 000 年十大兒童虐待新聞，回顧這些殘酷的事件內容，驚覺現代社會之惡質環境使兒童人權飽受踐踏與威脅之事實，新聞事件背後顯現之社會警訊不容漠視，兒童保護工作已刻不容緩。

經由這份民間團體之評選結果，可以觀察到，隨著的社會變遷，兒童虐待事件，施虐者與受虐者之關係、施虐態樣及情境案例上更趨複雜與病態，二年前，針對台灣省各縣市之兒童及少年保護通報態樣之研究分析，施虐類型以身體虐待、疏忽及管教不當為多，而今，這些浮上抬面的十大兒虐新聞中發現，性侵害、性虐待事件即佔有四件，而造成兒童身心傷害的對象，除家庭成員，亦包括鄰居、師長及保母等，此外，案例類型上，不止兒童及少年福利法所列舉範疇，傳播媒體對兒童教化（電視靈異節目）的負面影響，及運用電子媒體戕害兒童之色情網站也普遍引起重視。

觸目驚心的兒虐事件，除了閱聽報導之後產生對社會脫序感到惶恐的心理效應外，更期待社會每個人，願意實際付出關愛與行動，對社區灰暗角落、亟待援助的兒童伸出援手。同時，政府積極的措施上，單以個人歸因方式，探討加強失功能之親子與家庭關係，恐怕已不足解決快速變遷社會下的兒童虐待問題。許多研究指出，兒虐成因其實與社經環境、失業率、族群歧視、貧窮率、單親等社會結構導因有關，政策面上，除需釐清社會結構因素，提出解決策略，並在微視面針對不同的兒童及家庭需求，提供多元的支持資源，方能建構出完整的兒童保護網絡。

兒童福利法雖已明文規定政府公權力介入、加強兒童保護及各項兒童福利措施，然而，在兒虐通報及保護網絡仍未落實，服務資源亦有待整合。同時，條文上列舉之懲處與罰則，著重於照顧者之責任，以罰鍰及公告姓名等阻嚇方式，消極懲罰不適任家長

罰！

今日（11/25）蘋果日報 A3 版將男童全身傷痕累累的遺體照片，未進行任何處理便逕予刊出，這張照片赤裸裸且殘忍地呈現男童身體受虐的慘狀，顯已違反兒少法第 30 條第 12 款規定，對兒童及少年提供有害其身心發展的資訊，如此惡質的報導，實屬媒體教化的最壞示範，主管機關應就蘋果日報違法之情事，儘速予以裁罰，以積極維護兒童少年的閱聽權益！

☆媒體聯絡人：兒童福利聯盟 王育敏執行長 27486006 # 131 0925889725

李宏文組長 27486006 # 145 0910521351

**受虐兒二次傷害 專家籲媒體尊重  
媒體應該嚴厲恪守職業道德 不應以消費性角度報導虐童新聞**

【記者楊加／台北報導】根據內政部資料統計 2006 年兒少受虐案共有 10,084 件，創下歷史新高，對於層出不窮的虐童事件，媒體、社工和政府相關單位應如何發揮預防的守望功能，避免不幸受害孩童遭受殘忍的二次傷害？廣電基金於昨天舉辦「天下無不『噬』的父母？」虐童新聞報導之檢視座談會。與會人士一致認為，虐童新聞不應該是消費他人的新聞，媒體應該嚴厲恪守職業道德，民眾也可以發揮監督不當的父母與媒體的責任。

**廣電：受虐死還遭媒體凌遲**

廣電執行長林育卉強烈質疑媒體在報導虐兒新聞時，用驚悚渲染的方式消費他人的不幸。林育卉特別點名某有線電視的主播及編輯台，以獨家的方式將受虐兒童生前的悲慘哭喊叫聲拿來報導傳送。她說，這樣的報導現象不只讓人憤怒更令人心疼孩子連在死後還要被大人凌遲，她同時更對 NCC9 位委員的漠視不以為然。

林育卉認為，在民眾檢舉但行政機關卻不積極處理的情況下，全體閱聽大眾應當奮起自救，共同監督媒體的亂象，讓無辜稚嫩的生命不要再受傷害。

針對媒體不當報導孩童部分，林育卉呼籲更多熱心民眾在看到媒體侵權時要提出告訴，律師及相關政府單位應積極協助閱聽大眾對任意消費他人人權的不肖媒體進行訴訟，讓遺憾不再發生。

內政部兒童局托育服務組組長魏隆盛表示，兒童局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兒虐新聞，但面對媒體層出不窮地報導兒虐事件時，他呼籲媒體在報導時，應有比例方式的呈現，而內政部兒童局將持續致力於保護兒少工作，並加強 113 兒保通報專線的宣導，以達到預防高風險家庭不幸事件的發生。

少年福利法第 9 條（新聞主管機關除主管兒童閱聽權益外，增列隱私權益）、第 26 條（增列兒童少年不得提供個人或家庭隱私給媒體）、第 46 條（增列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及其他媒體不得報導親權、監護權事件之兒童少年）等。

會中專家學者也建議未來可參考國外作法，例如參考英國媒體申訴委員會(PCC)的自律規約( Code of Conduct )模式，規範媒體對於兒童事件的報導，進一步落實兒童的隱私權益。

桃園市前晚（11/23）傳出男童遭母親及同居男友過當管教，最後送醫不治的悲劇！眼見又一個稚嫩的小生命受盡折磨而殞落，我們何其痛心！但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在發生這麼多起兒童受虐致死的不幸事件之後，竟有媒體將這名受虐男童的姓名、身分、照片、甚至全身傷痕累累的遺體畫面，未經匿名、保護處理便直接刊出，嚴重侵犯兒童隱私權，罔顧往生男童尊嚴，並影響兒童少年的閱聽感受，讓未成年的孩子或一般大眾看來倍感不舒服，身為兒童權益的代言人，我們對此粗糙、噬血的報導，表達最強烈的抗議與譴責！

聯合報、蘋果日報揭露受虐男童的照片與身分資訊，嚴重侵犯兒童隱私權！

今天（11/25）的聯合報 A8 版「母與同居人 打死六歲兒」，以及蘋果日報 A3 版「虐 3 小時 6 歲童慘死」兩篇報導，內容揭露了這名受虐男童的全名、就讀學校與年級，還刊出男童的正面半身照片。男童年僅六歲，自是「兒童及少年福利法」所保護的對象，根據兒少法第 46 條規定，媒體不得報導或記載受虐兒童的姓名或足以識別其身分的資訊，聯合報與蘋果日報的報導手法明顯失當，不但侵犯了男童的隱私權，甚至有觸法之虞！此外，為了讓受虐兒童的保護更為周延，我們建議主管機關應比照「媒體對性侵害事件之報導保護被害人之處理原則」第二條規定，規範媒體報導兒虐事件時，即使受虐者已死亡，仍不得在報導中曝光受虐兒童的個人基本資料及相關資訊。

兩大報的不當報導，等同踐踏往生男童的尊嚴，罔顧新聞工作者的從業倫理！

對於兩大報在報導中直接刊登受虐男童照片的「用意」，我們百思不得其解！受虐男童雖已不幸往生，但即便是六歲的孩子，也和成人同樣享有身為一個「人」應得的尊重。撇開法律不談，媒體工作者處理這則新聞時，怎麼可以漠視往生男童的尊嚴，棄守新聞工作者的從業倫理，讓男童的身分資訊全都曝光？年初邱小妹妹受虐致死案殷鑑不遠，回顧事件爆發當時，尚未有媒體以如此粗糙手法進行報導，如今聯合報和蘋果日報竟大開倒車，令人扼腕！

男童遭虐之遺體照片未經處理即予刊登，明顯違反兒少法規定，主管機關應正視並儘速予以裁

作法，是否能夠有效的增進親職功能及遏阻兒童受虐，實有待商榷。針對目前兒童及少年福利法，依據年齡區隔分屬不同法規規範的方式，形成兒少福利措施、安置、輔導或保護等工作之延續與銜接之困擾，民間團體已倡議修法，期使保護工作、福利資源運用、福利設施及人員設置有所整合，學者參據聯合國兒童公約及各國之相關兒童法律，以十八歲以下為規範之國際慣例與世界趨勢，亦力促修法。

去年歲末，政府即於媒體發佈消息，將整合兩者法源，使「兒童」定義擴至十八歲。鑑於此舉將有助保障兒童及少年權益，在法制面更行周延，我們期待政府加緊腳步，使各項福利措施更形完善，讓兒童不再面臨暴力威脅的夢魘，年少歲月更加璀璨亮麗！

2007年1月24日

兒童虐待 慘不忍睹—女童像人肉沙包 吊著往死裡打

科技辦案 戳穿頂罪謊言

兒少人權觀點/

社會影響

#### 【直接刊登未經馬賽克處理之女童受虐照片 不當曝露當事人隱私 並呈現另一種影相暴力】

該則新聞報導直接刊出受虐女童受虐致死之傷痕照片，以及由記者示範加害者犯罪手法工具之照片，顯然報導者乃有意藉此照片，突顯出加害者之殘暴行為。兒虐事件近年來成為社會新聞大量報導的主軸，然在相關報導手法上，並未考量到直接曝光受害者往生時受虐之慘狀，不僅不尊重往生之受虐兒童，且相關影像或照片不斷重覆放大曝光之結果，對於長期受此影相下之閱聽人，也形成一種「目睹暴力」，同時也易產生對於兒虐事件無法制止之無力感。國際社會對於未成年事件之報導準則首重降低傷害，並要求在題材內容報導有所節制。兒虐新聞近年來經由媒體大量追蹤報導下，雖已喚起社會大眾之認知，然其報導手法，若不謹慎衡量其負面效果，恐無法收機會教育之效，反倒是引發潛在加害者之模仿效應。

#### 【過度詳述犯罪手法 缺乏建設性建議】

該則報導將近有五分之四篇幅，鉅細靡遺詳述加害者犯罪細節，直接曝光女童相關家人之身份資訊，已逾越兒少法第 45 條之規定。此外在新聞幕後特稿中，報導者大量提出個人對於受虐女童及加害者之主觀評論，已違反犯罪嫌疑人未經法院判決確定，採訪、報導時應保護其人權之「無罪推定」原則，及不主動採訪、報導偵查細節之「偵查不公開原則」。此外，該篇文章以「該女童何其不幸，竟然出身在殘暴的家庭，是她的宿命嗎？還是社會的倫理綱常出了問題？」做為最後結論，全篇未見對於兒虐事件有較為建設性之探討與建議，如對於國家有哪些兒虐預防政策措施，或是提供兒虐輔導資源。建議媒體記者在寫類似特稿時，應加強從更結構與多元的角度深入探討兒虐議題，而非只停留在宿命論的論述中，此無助於兒虐事件之社會性預防工作。

【東森新聞報 記者廖本福、張祖豪／黎明新村報導】

媒體在從事新聞採訪及報導時經常有不尊重人權的舉措，內政部兒童局呼籲新聞媒體在從事與兒童權益有關的新聞採訪及報導時應自律及自我約束，對於兒童事件報導宜有所規範，尊重兒童的隱私權。

兒童局假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舉辦該局委託研究計畫－「兒童隱私權與新聞自由研究計畫期中報告審查會」，這份報告提供英國對於兒童隱私權的法律政策等文獻，並針對兒童及少年福利法中有關兒童隱私與媒體管制的未來修訂方向提出具體建議，希望能夠維護兒童的隱私權益。

國內媒體報導侵害兒童隱私權的事件層出不窮，使兒童人格受到傷害。

兒童局指出，去年巴西男童吳憶樺(新聞)家屬爭取監護權事件一再被曝光，吳童被媒體跟拍與不當採訪，使得民間兒福團體高度關注此事，並譴責媒體報導的不當；接著媒體對南海海嘯(新聞、網站)倖存葉小妹的不當搶拍、訪問及今年邱小妹兒虐事件，媒體反覆以特寫方式拍攝當事人，均反應媒體一方面關心其安危，卻一方面侵害其隱私的弔詭現象。

黃碧霞表示，1989 年兒童權利公約第 16 條明文保障兒童隱私不得受不當的干預。

92 年公布實施的「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46 條規定：「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電腦網路或其他媒體不得報導或記載遭受第 30 條或第 36 條第 1 項各款行為兒童及少年的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身分的資訊。」也是保障兒童及少年隱私的具體作為，但是因為社會變遷迅速，上述規定是否能周全的保障兒童隱私，事實上，還有研究、討論的空間。

兒童局去年委託台灣終止童妓協會進行兒童隱私權研究，由國立中正大學法律系施慧玲教授及中興大學財經法律系高玉泉教授主持，透過學理的分析及國內外文獻蒐集，建議未來可修正兒童及

## 兒福：媒體以偷窺消費兒童

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執行長王育敏認為，媒體報導受虐兒事件看似關心孩子，但事實上是以窺探的方式消費兒童，企圖創造收視率。媒體往往只有受害者觀點，對於社會局及社工單位和社會各界的付出及未來應該共同努力的觀點極少，她認為目前媒體以社會新聞切入報導的方式嚴重失當。

她還指出，孩子是弱勢中的弱勢，情感及現實面孩子都需仰賴父母，所以法令是保護兒少最後關卡，在處理兒少新聞應從預防觀念出發，新聞自由與兒童保護完全不衝突，新聞選擇多如繁星，不需以偷窺的方式消費並殘害孩子。

台北大學社會系教授王雅各批評，媒體兒少受虐新聞的誇大真實性及蘋果日報動輒刊登聳動的照片，完全違背新聞專業性。他說，應從兩層面減少類似新聞出現，第一、天下有太多不是的父母，所以應從源頭改善，不適當父母者喪失監護權，沒有施虐者，就不會有受虐兒。

第二、加強媒體從業者的養成教育及加強閱聽人主體性的建立，讓製造新聞的從業人員具備專業道德倫理及強化閱聽大眾的媒體教育，媒體環境才可能改善。◇





隱私權的基本意涵之一在於，每個人都有權決定是不是要讓自己的個人資訊以及個人生活情狀暴露在他人的注視之下，也就是放到公眾之前，還是要將其保持在隱私的狀態之中。目前在我們的社會裡對於隱私權的認知與尊重都並不是那麼的足夠，因此，我們看到除了在家教育或是在學校教育中，家長和教師往往不自覺地做出侵犯孩子隱私權的舉動、國家政府機關不夠重視對於人民個人資訊的保護（如健保 IC 卡）之外，我們發現在現代這麼一個媒體強勢作為訊息主導的社會中，媒體中訊息的快速流通性使得新聞媒體的不當報導也往往嚴重地侵害了人們的隱私權。而更令人憂心地是，這些對於隱私權侵害的舉動，卻常常藉著「新聞自由」的保護傘而免於被加以檢視，尤其是在對於犯罪事件的社會新聞報導上，新聞媒體對於個人隱私的輕忽更是嚴重。

事實上，隱私權與新聞自由二者之間基本上就存在的一些緊張與衝突。這是因為隱私權的目的原本就在於保障有一塊個人可以自主的私人領域，而相反地，新聞自由則強調為了要追求公共之利益，因此要努力地將符合公眾「知的權利」的相關事務、細節，暴露於公共場域之中使民眾得以知曉。正因為二者的目的基本上而言恰是相反，因此，何者應歸屬於媒體不應加以侵犯的個人隱私權範圍，何者又應該劃歸為公眾知的權利範圍，二者之間便常有所衝突、爭論。不過，令人擔憂的是，近年來的台灣媒體越來越傾向於以辛癸的方式挑動觀眾的知覺，因此為了達成此一目的，對於個人隱私的侵犯也就越來越顯得嚴重，尤其是在與性話題相關的事件上，媒體往往更是不遺餘力地緊抓其相關細節予以詳盡描述以求聳動（甚至常常配合上模擬情境的圖畫或甚至真人演出），而無視於這些根本與公眾無關的事件部分內容乃屬於個人需被尊重之隱私。從下述兩項案件的事例中，我們便可以看出，在媒體的市場利益追逐中，個人的隱私權一再地被當作犧牲之祭品：

台中地區曾發生一起情殺案，兇手疑似因為女友要求分手感到不滿，而將女友以及所居住之處的其他一男二女加以砍殺，之後自己也跳樓身亡。除了其女友經送醫急救挽回其性命之外，這一事件共造成了四條寶貴年輕生命的喪失。此一案件發生之後，雖然兇手也已身亡，但就在檢察官調查案情，瞭解行兇動機的偵察案件過程中，出現了各種的臆測說法：由於當時受重傷的凶手女友尚未清醒，許多媒體都在一開始的報導中，都引述了一項傳言，也就是雙方分手的原因其實是因為兇手另與一名為「怡貞」的女子交往。於是原本是「用情太深過於衝動」的兇手一時之間成了腳踏兩條船的劈腿者，媒體並且指出這名名為怡貞的女子似乎是一名有夫之婦。但過了不到兩天，媒體再一次提出另一種說法，原來兇手交往的對象竟是一名男性，於是報導焦點開始轉向為討論：兇手究竟是一名同志，或是一名雙性戀？我們看到兇手的家人、朋友都遭到媒體的大肆包圍、追問，要他們證明兇手的性慾取向究竟為何？接下來，我們便看到沈溺於挖掘別人性向的媒體竟然在報導中指陳，在法醫的驗屍報告中發現了兇手的肛門有長期性的撕裂傷口，以此指涉其生前長期有著肛交的性行為，並暗示揣度死者的性向。

另一件案例則為民國八十七年時的高職女學生命案，當時這名高職女學生遭殺害的事件，由於兇手的故佈疑陣，使得警方懷疑死者可能是先遭性侵害之後才被殺害。因此，當時所有的媒體都將此犯罪事件描述為「女學生疑遭性侵害後被殺害」，而就在這些報導中，東森電視台輕率地一再使得被害人的名字被曝光，更糟糕的是，電視台竟在報導中描述了在死者的屍體上，其下體的部分被兇手插上了一把水果刀。（這樣的報導讓死者的家人非常不能諒解，認為這等於是對死者名節的傷害，因此後來家屬們向新聞局提出檢舉，新聞局也因此而對於東森電視台做出罰鍰新台幣九萬元的行政處分。）

上述的二項新聞報導都屬於犯罪事件的報導，不同點只在於一是關於兇手的報導，另一則是關於被害人。針對這二項報導，我們首先要指出的一項重點是：在新聞媒體的犯罪事件報導中，無論是對於被害者或是加害者的描述與報導，其出發點應該都是在於：由於犯罪事件對於社會公共安全秩序是一種嚴重危害，正因為其牽涉到整體社會的公共利益，因此民眾有權利瞭解該事件的相關細節，這也就是學者們所提出之所謂的「正當的公共關切」，也就是指公眾具有合法的利益，有權要求知曉事件之相關內容。換句話說，新聞媒體的報導應當是在「正當的公共關切」下出發，而不是在滿足私人所一欲窺探他人生活的動機下，挖掘別人的生活隱私。

從上述的脈絡下出發，以檢視前述所說的犯罪事件報導，我們便得以思考新聞媒體是否不當地侵犯人們之隱私的相關議題。就第一件台中情殺事件而言，加害人與被害人的感情糾紛與加害人本身的交往狀況，當然是判斷其為何行兇的重要依據，然而，探究其是否另有一名情感交往對象的過程中，卻不應該進一步地去論究當事人的性行為，尤其是舉出驗屍報告中所指的肛門撕裂傷，更是一種對死者的不尊重。因為，顯然地，除了滿足媒體對於性話題的渲染與利用之外，死者生前是否曾進行肛交此類的性行為根本與瞭解案情無關，更何況法醫的驗屍報告應屬偵察的一部份，而根據偵察不公開的原則來看，為何此驗屍報告的內容會被予以洩漏，本身就是一項應被質疑的過程，而媒體為了吸引注意，竟將這些死者的個人生理狀況以及私人性生活的情形公布於媒體之中，這顯示出為了製造新聞，媒體大可忘記對個人隱私應有的尊重。

而在第二項案例中，媒體這種只求製造聳動驚奇的心態，而則更是暴露無遺。在這一名女學生的被殺害案件中，女學生遭殺害的手段與方式，當然是瞭解案情的關鍵，因此在這一類案件的報導中，死者生前是否遭性侵害當然也會是報導的重點之一，然而，詳細地去描述死者的下體遭兇手插入一把水果刀則完全只是暴露出媒體嗜血的心態，而非出自於善盡報導者滿足公眾「正當之公共關切」的媒體責任所在，因為在這當中，我們看不出任何與公共利益有關的意義存在，而只看到媒體對死者的不尊重所造成死者家屬受到的二度傷害。

如同前面所說，媒體的報導是為滿足「正當的公共關切」，而事實上，我們也確實看到過去以來，正因為媒體對於許多事件的耗費心力採訪、追蹤，才使得大眾對於許多公共事務有較清楚之瞭解，然而，對於以追求真相、挖掘事實自許的媒體來說，卻也應該清楚地意識到，新聞的報導對於相關的當事人可能會造成什麼樣的困擾甚至是傷害。因此，尊重個人隱私與實現公眾正當公共關切二者之間的份際，需要新聞媒體以更大的智慧，以及更重要的是，更誠實的職業道德來加以判斷，而不是一再以滿足民眾知的權利來欺騙自己、欺騙公眾。

要分辨的是，新聞媒體的作用並不是無所原則地用來滿足民眾的好奇心，如果媒體不以「正當性」「公共性」的標準來守住自己的專業，並守住被報導者的隱私權，那麼，新聞媒體將自淪為探人隱私的八卦報導，而這樣的沈淪將會是整個社會的損失，更是對人們權利的一種威脅與侵害。

#### 肆、生命法益在刑法上的地位

人生活在社會上有著種種的利益存在，立法者選取了其中的重要利益規定在刑法，一般將刑法所保護的這些利益稱為法益。這些利益有來自於財產上的，稱之為財產法益，有來自於個人的生命、身體的完整的概念，稱之為生命法益、身體法益。上述這些法益雖然都為刑法所保護，但刑法並未一視同仁。

以竊盜罪為例，竊盜罪所保護的法益為財產法益，如果行為得到被害人的承諾，行為人的行為並不成立竊盜罪，國家也就不能任意發動刑罰權。但是在殺人罪例子上，即使得到被害者的承諾而殺人，行為人的行為仍然成立刑法第 275 條的殺人罪，國家可以對其發動刑罰權。雖然刑法第 275 條的同意殺人罪，與刑法第 271 條的殺人罪在刑度上是有差別的（前者較輕），但是，二者都是殺人罪的一種型態，行為都是犯罪並無不同。

從刑法第 275 條與刑法第 271 條並存的現狀來看，在安樂死的行為上，如果是強制施以安樂死，會成立刑法第 271 條的普通殺人罪。如果是得到被害人承諾的安樂死，也就是任意安樂死的行為，會成立刑法第 275 條的同意殺人罪。這也映證了安樂死在現行刑法上是沒有存在的空間。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刑法對於生命法益的理解，認為生命法益是至高無上的。刑法以刑罰權保護生命法益的態度，不會因為被害人的承諾，或者是安樂死的行為如何的符合人道原則，而有所變動。這樣的想法不只在我國，應該說這樣的想法是居於當代世界刑法思想的主流（荷蘭是例外）。

雖然很難期待上述的主流思想會發生根本上的變動，但是也不是完全不動。至少在上述的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上，法律對於生命法益的認識，不再採取如此絕對至高無上的態度。回到安樂死的事例上，安樂死合法化所帶來的利益，與維持現行不合法所帶來的利益何者為重，仍然是必須正面論述的問題。



## 回應女童疑遭性侵害事件 —兒童隱私權保護，請想想她的未來

賴月蜜

新莊女童疑遭性侵害案件，因檢察官不起訴處分，家長在立委的陪同下，召開記者會控訴家暴中心仍未讓孩子返家一案。因全案仍在司法審理中，本文暫不就事件本身為評論，但就該事件爆發後，部份平面媒體，擅自公布女童父親姓名、就讀學校年級等，已嚴重侵害女童之隱私權，有違兒童資料保密之保護。而電子媒體部份，一開始還以馬賽克或模糊方式處理女童父親及其家屬面貌之畫面，然而，在家長數日連續抗爭情況下，部份電子媒體亦已忽略了初始謹慎處理的態度，現在竟然在電視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女童父母的面貌。

我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十條規定：「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不報導或記載性侵害事件被害人姓名或其他足以辨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而該立法意旨乃係在保護被害者隱私權之權益，因事件之發生已屬不幸，倘將其個人資訊揭露，無非係再度遭受媒體之侵害，使其傷害再度赤裸裸地呈現在大眾面前，而更難走過傷痛。

又在兒童性侵害案件中，倘加害者為其父親或有特定關係者，即不得公佈犯罪嫌疑人之姓名，其處理方式並不是在保護犯罪者，而係倘公布父親為犯罪者或犯罪嫌疑人之姓名或其他資訊，豈不等於召告天下，該女童為何人，故基於保護該女童之隱私權，媒體亦不應將父親之資訊曝光。再就本案雖經不起訴處分，惟在司法程序上仍可針對不起訴處分提起再議，故案件仍未確定，父親仍有犯罪嫌疑。退步言，縱使全案在刑事審判上為不起訴或無罪判決確定後，足以辨識該女童之個人資訊亦不得公開。因為，不論事情真相如何，女童被捲入如此不名譽的性侵害案件，就其身心都需要長時間的重建與輔導，孩子還小，還有漫漫人生要走，終其一生，可能隨時都要接受到他人異樣地詢問與考驗，媒體為逞一時之收視率或閱報率，逕將其資訊公布，惟長期之影響，對女童之傷害有多麼地嚴重。

在人權逐漸受重視的時代裡，及十一月二十日世界兒童人權日將至的時刻，我們很傷心地看到台灣兒童的人權，還是如此地受漠視及受踐踏。該事件僅聚焦在家長對家暴中心之控訴，而該女童呢？誰去想到該女童的未來，雖然慶幸家暴中心在面對家長及媒體之巨大壓力下，仍能秉持堅守社會工作之專業倫理、保密原則，未加入記者會或媒體口水戰急於去澄清辯解他們所認知的事實，使該事件之事實不致透過媒體而被過度地渲染開來，然而，該女童在事件曝光後，以後將如何去面對熟識或不熟識的人，其隱私權未被受重視保護下，所帶來之傷害。站在保護兒童權利的團體而言，我們不禁要呼籲，請媒體之報導要以「兒童為本」，想想孩子的未來，在針對與兒童有關之新聞報導時，請善盡兒童資訊保密原則，以免對兒童造成難以彌補之傷害。

1989年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十六條清楚地規範兒童隱私權的保護，而針對兒童隱私權的保護，我們在這次兒童少年福利法的修法工作中，在民間版第四十八條特別明文規範：「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不得報導、記載違反第二十六條（兒童少年為不當之行為，如吸菸、飲酒、嚼檳榔、施打毒品、出入不當場所或在不良場所工作、逃學逃家、飆車或參與飆車行為等）或遭受第三十四條（兒童少年遭受遺棄、身心虐待、不當非法之對待等）、第三十八條第一項行為（兒童少年被緊急保護安置之情形）兒童及少年之姓名及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製作前項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前項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期待在這次立法院會期，兒童少年福利法的修法工作能夠儘快完成，使我國兒童隱私權的權益，能有更清楚地法律規範，真正受到保護。

第二十二條 廣告物、出版品、廣播、電視、電子訊號、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不得報導或記載人口販運被害人之姓名或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經有行為能力之被害人同意。二、犯罪偵查機關依法認有必要。三、被害人死亡，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衡社會公益，認有報導必要。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前項請求權，不得讓與或繼承。但以金額賠償之請求權已依契約承諾，或已起訴者，不在此限。

前二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

所謂其他人格法益，是立法者預慮到社會進步的結果可能會發展出 195 條第 1 項規定列舉的七種人格法益以外的人格法益，故以概括規定之方式為之。所以要說其他人格法益包含什麼，要去看各各不同實務上案例的發展，無法一一列舉。

我國民法對侵權行為的規範，以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為重心，該條第一項前段採概括規定，所保護之客體為「權利」。權利可區分為人格權、物權、身分權等。所謂人格權，指一般人格權而言，乃關於人之價值與尊嚴的權利，特別人格權則是由一般人格權所衍生出，經具體化的個別人格權，可再分為法定與未法定兩種。

就侵權行為法的發展歷史而言，侵權行為法對人格權的保護首重生命、身體、健康、自由等權利，接著擴及名譽及隱私。民法第十八條規定：「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時，得請求防止之。前項情形，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得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金。」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是請求損害賠償（包括財產上及非財產上損害）之基礎規定，但因慰撫金（即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之請求受到第十八條第二項之限制，必須法律有特別規定，因此並非所有人格權受侵害之情形，均能請求慰撫金。民法第一百九十四條就侵害生命權、~~第一九五條~~是就侵害他人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第十九條則為姓名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慰撫金之特別規定。由此可知，生命、身體、健康、名譽、自由、姓名、信用、隱私、貞操係法定的特別人格權，除此以外的「其他人格法益，而其情節重大者」，係針對其他未經法律明定之人格權受侵害而設之限縮要件，必須視行為人的故意或過失及所受侵害之嚴重程度而定，避免浮濫，這一部份人格權將會隨著人民對人格自覺、社會進步及侵害增加，擴大其保護範圍，肖像權即為法律未明定而普遍認其為重要之人格法益者。